

史学互鉴视域下帕提亚文化记忆在东西方古代世界的流变*

龙 沛,郭欣如

(西北大学 区域国别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摘 要:西方古典史料、波斯史料和中国史料中的帕提亚历史信息及其文化记忆,具有密切的互补交流关系。安息王室正统和帕提亚贵族集体认同是帕提亚帝国留下的重要政治文化遗产。而中国史料对于条支与安息关系的记载,可以有效补充西方古典史家构建的帕提亚史基本框架。帕提亚帝国在东西方古代世界留下了鲜明的文化记忆。三种史学传统的互证交流,有力地揭示了帕提亚帝国文明遗产的多元性和持久性。

关键词:帕提亚帝国;安息王朝;文化记忆;史学互鉴

DOI: 10.13568/j.cnki.issn1000-2820.2026.01.006

中图分类号:K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20(2026)01-0049-09

在希腊罗马历史著述中,帕提亚人往往以罗马帝国边疆之外不安分的半开化“蛮族”形象出现。帕提亚人善于骑射,曾取得大败罗马军团的辉煌胜利。^①进入汉代中国的帕提亚人,以安世高为代表,在佛教传播史上作出了巨大贡献。^②而在伊朗民族史叙事中,帕提亚时期似乎是四分五裂、不值一提的混乱时代。那么,作为统治伊朗高原四百年之久的帕提亚帝国,我们应该如何全面评价其历史地位与遗产?笔者拟从希腊—罗马、伊朗和中国三种史学传统中的帕提亚帝国形象及其文化记忆入手,比较三者之间的异同和互补关系,并从文化记忆和史学互鉴的角度,加深对帕提亚史乃至帕提亚文明遗产的理解。^③

一、从“帝国边民”到“波斯正统”:希腊—罗马史学传统认知中的帕提亚人

“帕提亚人”出现在希腊史家视野中,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在描述波斯帝国西征大军的族群结构时,帕提亚人往往与波斯帝国治下的其他伊朗和中亚族群同时出现。而在希罗多德记载的波斯帝国行省贡税名单中,帕提亚人和其他三个中亚族群居住的区域被一起划为第16行省。^④根据波斯皇室铭文可知,帕提亚的古波斯语形式是Parthava。这一称谓有三层含义:作为波斯帝国臣属族群的帕提亚人(Parthians)、帕提亚人所居住的帕提亚地区(Parthava Dahya)、波斯帝国的帕提亚行省(Parthia Satrapy)。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众王之书》与萨珊帝国时期的波斯史学研究”(24CSS048)。

作者简介:龙沛(1993—),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中东研究所副教授,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从事伊朗史和中亚史研究。

①See Plutarch, *Plutarch's Live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16, XXI. 6-XV. 1, pp. 379-393; R. James Ferguson, “Rome and Parthia: Power politics and diplomacy across cultural frontiers,” *The Centre for East-West Cultural and Economic Studies*, Research Paper no. 12 (December 2005), pp. 10-11.

②参见仝佩成:《〈郎戴亚和约〉与安世高身份之谜解析》,《外国问题研究》2021年第2期,第91—98页。

③目前来看,已有研究多关注西方古典史学和汉代中国对帕提亚帝国的记载,相对忽视伊朗史学传统对帕提亚帝国的认知。参见杨巨平:《帕提亚王朝的“爱希腊”情结》,《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第180—201页;王三三、邵兆颖:《帕提亚人的斯基泰渊源——文献与考古学证据》,《世界历史》2014年第2期,第100—115页;Marek Jan Obrycht, *Early Arsakid Parthia (ca. 250—165 b.c.)*, at *the Crossroads of Iranian, Hellenistic, and Central Asian History*, Leiden & Boston: Brill, 2021; Nicolaus Leo Overtoom, *Reign of Arrows: The Rise of the Parthian Empire in the Hellenistic Middle Ea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M. Rahim Shayegan, *Arsacids and Sasanians: Political Ideology in Post-Hellenistic and Late Antique Per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④帕提亚(Parthia, 希腊语 παρθία)一词最初指代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20个行省(satrap)之一,位于伊朗高原东北部,并与花刺子模(Chorasmia)、粟特(Sogdia)和阿里亚(Aria)一起构成第16个纳税行省。大流士一世的贝希斯敦铭文上所列的帕萨瓦(Parthava)即Parthia一词的古波斯语形式。而Parthia一词系罗马人由Parthava的希腊语形式 παρθουνη (Parthyene)对译而来的拉丁语形式,其复数(属格)形式 Parthorum 即可对应英文的 Parthians。

作为波斯帝国的属民,帕提亚人有着自己独特的民族服饰。但总体而言,波斯帝国时期的帕提亚人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上与米底人、波斯人和中亚伊朗诸族是相近的。^①可以说,这时的帕提亚人是与波斯人一样农牧兼营,并在战争中主要充当步兵的波斯帝国臣属民族。

亚历山大东征后,希腊—马其顿征服者与帕提亚人开始有了直接的接触。然而,由于早期希腊化史学著述的散佚,我们只能通过晚至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斯特拉波(Strabo)和庞培·特洛古斯(Pompeius Trogus)等作家的记载,来观察公元前3世纪中叶作为国家的帕提亚崛起于希腊化东方这一历史现象。在世界古代史通行叙述中,大部分学者都采用这一来自斯特拉波和庞培·特洛古斯的记述。这一叙事认为,帕提亚帝国的建立,是中亚斯基泰游牧入侵者攫取塞琉古帝国帕提亚行省的结果。^②也即,帕提亚帝国的建立者是来自中亚草原的征服者,波斯帝国时期的帕提亚人则是被征服者。既然如此,为何希腊罗马作家仍然继续把这一国家称作“帕提亚”?

根据斯特拉波的记载,帕提亚帝国的开国人群来自里海东岸的斯基泰人部落Aparni。不仅如此,查士丁认为Parthia的词根Parthi在斯基泰人的语言中含义是“流亡者”:

“现在与罗马人平分世界的东方主宰——帕提亚这个帝国,起初本是来自斯基泰的流亡者。因为在斯基泰人的语言中,帕提亚(parthi)就是流亡者(exules)的意思。”^③

这里常困扰史学家的问题是:“帕提亚”这一族称和地名在波斯帝国时期就已存在,为何还需要在公元前3世纪由中亚的斯基泰流亡者(同时也是入侵者)引进?不仅如此,斯特拉波还告诉我们,“他们(帕提亚人)的生活方式,还有风俗习惯,在许多方面都具有蛮族和斯基泰人的特点(αἴτιος δ' ὁ βίος αὐτῶν καὶ τὰ ἔθη τὰ ἔχοντα πολὺ μὲν τὸ βάρβαρον καὶ τὸ Σκυθικόν)”。^④众所周知,善于骑射的帕提亚人给罗马军团留下的深刻印象,与古希腊城邦所面对的波斯帝国帕提亚仆从部队差别不可谓不大。希腊化时代以降的古典作家观察到的帕提亚人,与波斯帝国时期的帕提亚人相比,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斯基泰化”,也即表现出浓厚的草原游牧传统。^⑤但尽管反复强调这一特征,希腊罗马作家并没有将帕提亚人与斯基泰人等同,而是继续使用“帕提亚人”来指代这一可能有斯基泰游牧渊源、在塞琉古帝国后期不断扩张,并最终统治幼发拉底河至阿姆河之间波斯帝国故土的多民族帝国。至此,“帕提亚”从古波斯行省名称演变为古典史家对罗马帝国以东最强大政治实体的称谓。

到了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的希腊作家阿里安(Arrian)在其《帕提亚史》(Parthica)残篇中,记述了迥异于早期罗马作家记述的帕提亚起源叙事。这一叙事虽然也残留有关于帕提亚人与斯基泰人渊源关系的记述,却着重强调帕提亚人的“波斯起源”:

“阿萨息斯和提里达特是两兄弟,他们的世系追溯至波斯王阿塔薛西斯,在马其顿人阿加托克里斯担任波斯总督期间,阿萨息斯和提里达特是巴克特里亚总督。阿加托克里斯爱上了两兄弟之一的提里达特,想要诱拐这个年轻人。但阿加托克里斯失败了,并被两兄弟杀死。阿萨息斯成了波斯人的王,自此之后波斯人的国王都叫作阿萨息斯。”^⑥

阿里安的记载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帕提亚帝国对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室血统的追认。这种追认,通常被认为是晚期帕提亚帝国“波斯化”的结果。但尼萨出土的公元前1世纪帕提亚王室庄园陶片铭文

①帕提亚语属于中古伊朗语西北方言,与中古伊朗语西南方言即中古波斯语相近,同属于中古伊朗语西支。See W. B. Henning, “A List of Middle-Persian and Parthian Word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 9, no. 1 (1937), p. 80.

②See Kai Broderson, “The Date of Secession of Parthia from the Seleucid Kingdom,” *Historia: 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 Bd. 35, H. 3 (1986), pp. 378-381.

③Justin, *Epitome of the Philippic History of Pompeius Trogus*, trans. J.C. Yardley, 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94, XLI. 1, pp. 253-254.

④Strabo,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vol. 5,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17, XI. 9. 3, p. 277.

⑤需要指出的是,早期帕提亚钱币的国王像头戴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总督式的帽子,而非斯基泰人(或塞种人)的高耸尖帽。See M. T. Abgaryans and D. G. Sellwood, “A Hoard of Early Parthian Drachms,” *The Numismatic Chronicle*, 1971, p. 103.

⑥Arrian, *Parthica*, <http://www.attalus.org/translate/fgh.html#156.0>, March 11, 2025.

中,已经出现阿塔薛西斯(Artakhshatra)这一王名。^①该王与其他安息王室先王一起,位列帕提亚人的王家宗庙祭祀名单中。这表明对阿契美尼德波斯王室的认同,在帕提亚帝国全盛时期已经存在。而公元1世纪初,罗马作家塔西佗在《编年史》中,也记述了帕提亚国王阿塔巴努斯二世对阿契美尼德法统和马其顿法统的双重宣称:

“……与此同时他(指阿塔巴努斯二世)虚荣自负地谈到此事,并以波斯人和马其顿人的古老疆界相威胁,并说他会夺取先后被居鲁士和亚历山大统治的领土。”^②

亚历山大的正统血脉在希腊化时代早已断绝,但塞琉古王室与帕提亚王室之间却存在实实在在的婚姻关系。公元前2世纪德米特里二世(Demetrius II)在被米特里达梯二世(Mithridates II)俘虏后,曾娶过帕提亚公主罗多古涅(Rodogune)。^③而塞琉古王朝在公元前3世纪已经开始与拥有波斯贵族血脉的卡帕多西亚王国(Cappadocia Kingdom)联姻。^④通过塞琉古王朝这一纽带,帕提亚人不仅通过帝国扩张证明自己有继承波斯帝国和马其顿帝国遗产之“实”,也力图论证自己在血统上与波斯王室和希腊化王室之间确实沾亲带故,因而其得位有“名”。

然而,在以普世帝国自居的罗马人面前,帕提亚的“帝国(imperium)”属性即使被承认,也不具有可与罗马的“文明(civis)”相提并论的内涵。^⑤帕提亚人的“斯基泰性”,既可以作为罗马知识精英解释帕提亚人建立帝国霸业的“朴素”特质,又可以作为否定帕提亚人具有和罗马人同等文明程度的“野蛮”标志。在希腊—罗马传统历史叙事的操纵下,我们如今已经很难判断,帕提亚帝国究竟代表“斯基泰”这一中亚草原游牧传统,还是“波斯”这一更加定居化,因而也似乎更加“文明化”的西亚传统。

实际上,伊朗高原和中亚游牧人群与定居人群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很多时候是超越族群边界的。考古证据业已表明,公元前3世纪中叶的帕提亚地区,确实出现了游牧聚落扩张和定居社会萎缩这两大现象。但如果我们将这一现象完全解读为“游牧入侵定居”,可能会失之简单。中亚和伊朗高原各族内部不仅有农牧分工现象,而且农业人群和畜牧人群之间还会发生周期性的相互转化。波斯帝国时代的“帕提亚人”,未必一直都是农业居民。而在帕提亚开国过程中似乎扮演过重要角色的阿帕尔尼人,也未必就是阿萨息斯的同族。Arsaces这一名字,在波斯帝国时期早已出现,而且还是波斯王阿塔薛西斯一世和阿塔薛西斯二世的本名。如果简单地把帕提亚帝国的统治族群与“斯基泰人”划等号,将如何解释斯基泰部落首领从一开始便采用波斯王室名字这一现象?更有可能的事实是,阿萨息斯就是一个带领着斯基泰雇佣军打回自己故土并建国称王的帕提亚人甚至波斯人。这样来看的话,帕提亚帝国从一开始便是中亚南部游牧社会与定居社会相互合作的产物。

对于希腊—罗马认知传统中的帕提亚叙事,我们在批判其主观认知局限的同时,也应肯定这一传统对于现今学者重建帕提亚基本历史脉络的核心贡献。尤其是在帕提亚本土传世文献几乎完全缺位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从罗马—拜占庭史家的记载中,窥见帕提亚帝国的另一重要遗产——安息王室认同在伊朗高原以及南高加索贵族社会的扎根:

“他们(波斯人)十分崇敬和崇拜阿萨息斯,这种崇敬延续的时间之长,甚至到我们的时代。据说波斯只要还有一个阿萨息斯后裔,他便拥有登上王座的优先权。”^⑥

公元4世纪的罗马史家阿米安(Ammianus Marcellinus)生活的时代,罗马帝国的东方邻居已经由安

①See E. J. Bickerman, “The Parthian Ostrakon No. 1760 from Nisa,” *Bibliotheca Orientalis*, vol. 23(1966), pp. 15-17.

②Tacitus, *Annals*, trans. Alfred John Church and William Jackson Brodribb,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2, VI. 31.

③See Justin, *Epitome of the Philippic History of Pompeius Trogus*, XLI. 39, p. 257.

④See Charlotte Lerouge-Cohen, “Persianism in the Kingdom of Pontic Cappadocia. The Genealogical Claims of the Mithridatids,” in R. Strootman and M. J. Versluys, eds., *Persianism in Antiquity*,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2017, pp. 223-234.

⑤See Charles Brain Rose, “The Parthians in Augustan Rome,”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 109, no. 1 (2005), pp. 21-75.

⑥Ammianus Marcellinus, *The Roman History*, trans. C. D. Yonge, London: G. Bell & Sons Ltd, 1911, p. 331; J. W. Drijvers, “Ammianus Marcellinus’ image of Arsaces and early Parthian History,” in Drijvers and Hunt, eds., *The Late Roman World and its Historian. Interpreting Ammianus Marcellinu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p. 193-206.

息帝国变为萨珊帝国。即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阿米安仍然提醒我们安息王室后裔在波斯所受到的尊崇。224年帕提亚帝国灭亡后,安息王朝在南高加索的亚美尼亚王国继续延续着,直到428年才被萨珊帝国废藩置省。^①安息王朝对亚美尼亚的统治影响极为深远,亚美尼亚语中大量的帕提亚语借词便是证明。^②即使到了公元6世纪,反叛拜占庭帝国的亚美尼亚贵族在说服波斯王库思老一世(Khosrow I, 531—579年在位)撕毁与拜占庭帝国的和约时,仍然不忘追溯自己的安息王室贵胄身份,以博得萨珊君主的同情:

“哦,陛下!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安息王室苗裔(Arsacidæ),是在波斯臣属于帕提亚时,与帕提亚国王沾亲带故的阿萨息斯的后代,阿萨息斯在那个时代是独一无二的明君。”^③

罗马—拜占庭史家的记载表明,安息王室认同在帕提亚帝国灭亡后,仍然在伊朗高原和南高加索地区以各种形式延续到了古代晚期。公元6世纪初,萨珊帝国在吞并高加索阿尔巴尼亚王国之后,在当地建立了新的总督府,并命名为Partaw(即中世纪时期著名的Barda)。^④Partaw与帕提亚一词的帕提亚语形式Parθau之间的渊源关系显而易见,安息帝国在伊朗高原及其周边地区留下的丰厚遗产可见一斑。

二、“裂土藩王”还是“王朝支柱”:伊朗史学传统认知中的帕提亚人

帕提亚帝国是伊朗历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统一政权,然而伊朗人对于帕提亚帝国的记忆十分模糊。一般认为,萨珊帝国建立后,为了论证自己的合法性,有意地抹除、压制甚至消灭帕提亚时期的历史记忆。在中古波斯—阿拉伯历史文献中,有一个词语被专门用来形容从亚历山大东征到萨珊帝国建立之间的历史时期:Muluk al-Tawa'if。这一词语的字面意思是“分裂的诸王国”,即裂土藩王。^⑤在萨珊帝国时期确立的、以《众王之书》(Khwadāynāmag)为奠基框架的伊朗民族史叙事中,亚历山大在东征之后听从亚里士多德的建议,对伊朗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以防止伊朗重新统一并向“罗马”复仇,如伊朗史诗《列王纪》(Shāhnāme)所述:

“亚历山大以后无人登上王座。有一批阿列什(Aresh)家族的后人,他们都豪勇暴躁自傲自尊。他们统领一方各居一地,一小块地面就归他们治理。他们发号施令得意扬扬,人们称他们为裂土藩王(Muluk al-Tawaif)。这种格局维持了二百年之久,二百年间无一中央国王为首。这是亚历山大策划的结果,这样罗马(Rūm)就可以不遭灾祸。”^⑥

也就是说,伊朗民族史传统对于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历史记忆,基本可以用“四分五裂”“黑暗时代”等词语形容。在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处理中,塞琉古王朝被彻底“除名毁忆(Damnatio Memoriae)”。而帕提亚帝国470年的历史,也作为没有中央权威的“封建社会”全盘均质化,从而为萨珊帝国开国君主阿达希尔一世作为伊朗乱世的革新拯救者形象背书。然而,最新的研究已经充分表明,萨珊家族与安息王室有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萨珊王族的父系一脉,很有可能来自帕提亚帝国东部边疆的安息王族萨纳特鲁克支系(Sanatrakids)。^⑦根据亚美尼亚史家的记载,帕提亚帝国覆灭后,大部分帕提亚贵族世家都重新投靠

① See N. Ouzounian, *The Heritage of Armenian Literature: From the Oral Tradition to the Golden Age*,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84.

② See Robin Meyer, “Armeno-Iranian Structural Interaction: The Case of Parthian xwd, Armenian ink'n,” *Iran and the Caucasus*, vol. 17(2013), pp. 401-425.

③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trans. H. B. Dewing,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14, II. 3. 28-34, p. 54.

④ See Murtazali Gadjiev,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of Kavād I in Caucasian Albania,” *Iran and the Caucasus*, vol. 21, no. 2 (2017), pp. 121-131.

⑤ See Tabari, *The History of al-Tabari*, vol. 5: *The Sasanids, the Byzantines, the Lakhmids, and Yemen*, trans. C. E. Bosworth, Albany: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p. 1.

⑥ [波斯]菲尔多西:《列王纪全集(六)》,宋丕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69页。

⑦ See M. J. Obrycht, “Parthia et ulteriores gentes. Die politischen Beziehungen zwischen dem arsakidischen Iran und den Nomaden der eurasischen Steppen,” *Quellen und Forschungen zur Antiken Welt*, vol. 30, München: Tuduv-Verlagsgesellschaft mbH, 1998, p. 109.

并效力于萨珊帝国,只有卡林(Karen)家族的一小部分逃到亚美尼亚,继续与新朝作对。^①不仅如此,伊朗民族史诗《列王纪》更花费大量篇幅,在借鉴古代西亚文学弃婴母题的基础上,描绘了阿达希尔一世与帕提亚末代公主私奔,并生下后来的王储沙普尔一世的故事。^②《黄金草原》和《列王纪》对安息王朝的叙事虽然篇幅寥寥,但阿尔沙克这一王名反复出现,显示出对阿萨息斯作为帕提亚君主通用称号的历史记忆,而阿什康尼王朝(Ashkanian)的名称正是来自Arshak一词的两次复数扩展(Arshak>Arshakān>Ashkāniān)。^③在萨珊波斯知识精英看来,帕提亚帝国统治时期固然是分裂衰弱、国力不振的晦暗时期。但正如罗马—拜占庭史家所记载的一样,安息王室的血统合法性一直被后亚历山大时代伊朗社会所普遍认可。

在萨珊帝国的等级制社会结构中,武士种姓包括亲王(Shahrdaran)、贵族世家(Vuzurgan)和小贵族(Azadi)三个等级。^④其中由帕提亚七大家族构成的贵族世家,是萨珊帝国不可或缺的政治军事支柱。即使到了6世纪库思老一世改革之后,萨珊帝国四大军区的将军(Spahbed),仍然大多由米赫兰(Mihran)、卡林和埃斯帕赫布丹(Espahbudhan)家族充任,而萨珊王室长期与埃斯帕赫布丹家族维持着联姻关系。^⑤萨珊帝国后期的著名将领中,巴赫兰·楚宾和沙赫巴拉兹来自米赫兰家族,而在抵抗阿拉伯人的战争中充当中流砥柱的鲁斯塔姆(Rustam Farrokhzad)来自埃斯帕赫布丹家族。^⑥萨珊帝国灭亡后,帕提亚贵族世家联合萨珊王室支脉,在里海南岸山区建立了多个地方独立小王朝,最长者一直延续至16世纪。美籍伊朗学家博沙里亚提认为,在末代萨珊王耶兹底格德三世(Yazdgerd III, 632—651年在位)逃往伊朗东部的过程中,埃斯帕赫布丹家族和卡林家族之间由于政见不合而爆发内战。卡林家族分支选择继续支持萨珊王室避难于呼罗珊,而埃斯帕赫布丹家族则选择与泰伯里斯坦的达布伊王朝(Dabuyid Dynasty, 640—760年,即唐代史籍中的“陀拔斯单”)联合,试图固守伊朗北部山区。^⑦耶兹底格德三世遇刺身亡后,卡林家族和埃斯帕赫布丹家族均没有投降阿拉伯人,而是在泰伯里斯坦建立起卡林万德王朝(Qarinvand Dynasty, 550—1106年)和巴万德王朝(Bavandids, 651—1349年)。^⑧760年达布伊王朝灭亡后,卡林万德王朝和巴万德王朝遂成为完全独立的割据政权,成为抵抗阿拉伯帝国的中坚力量。^⑨

在伊朗民族史传统叙事中,在亚历山大东征和裂土藩王之前的时代,伊朗曾经非常强大,长期以宗主国的身份享受图兰、印度和罗马诸国的朝贡,这一王朝就是所谓的凯扬王朝(Kayanian Dynasty)。凯扬王朝的核心王系大部分来自《阿维斯塔》中的神话传说,其历史记忆的底层可以追溯至印度—伊朗雅利安共同体时代。但凯扬王朝同样保存了关于米底帝国、阿契美尼德帝国和帕提亚帝国的历史记忆。只是这种保存方式由于不符合西方科学化史学的标准,而长期被认为是随意的加工、剪裁和拼接。阿拉伯史料和《列王纪》的记载表明,萨珊帝国官方历史叙事十分强调萨珊家族与凯扬王朝的渊源关系,尤其是将阿达希尔的世系追溯至凯扬王朝的国王巴赫曼(Kay Bahman)。^⑩在古代晚期中古波斯语天启文献中,巴赫曼

①See M. Rekaya, “Kārinids,” *The Encyclopedia of Islam*, New Edition, vol. 4, Leiden and New York: Brill, 1997, pp. 644-647.

②根据《列王纪》的记载,帕提亚安息王朝覆灭后,嫁给阿达希尔一世的帕提亚王妃古尔纳尔欲报仇未果自杀,死前古尔纳尔将与阿达希尔一世所生之子沙普尔交给大臣收养,沙普尔长大后在马球场上重新与父王阿达希尔一世相认。也即在伊朗传统中,沙普尔一世身上有一半的帕提亚血统。参见〔波斯〕菲尔多西:《列王纪全集(六)》,宋丕方译,第240页。

③See Marek Jan Obrycht, *Early Arsakid Parthia (ca. 250—165 b.c.)*, at *the Crossroads of Iranian, Hellenistic, and Central Asian History*, p. 253.

④参见孙培良:《萨珊朝伊朗》,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1—32页。

⑤See Parvaneh Pourshariati,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Sasanian Empire: Sasanian-Parthian Confederacy and the Arab Conquest of Iran*, London: I. B. Tauris, 2008, pp. 26-27.

⑥See D. Gershon Lewental, “The Death of Rostam: Literary representations of Iranian identity in early Islam,” *Iranian Studies*, vol. 11, no. 2(2017), pp. 223-245.

⑦See R. N. Frye,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4: *The Period from the Arab Invasion to the Seljuq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00-219.

⑧See R. N. Frye, “Bāwand,” *The Encyclopedia of Islam*, New Edition, vol. 1, Leiden and New York: Brill, 1986, p. 1110.

⑨See H. L. Rabino, *Les Dynasties du Māzandarān*,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36, pp. 409-437.

⑩See Djalal Khaleghi-Motlagh, “Bahman,” *Encyclopaedia Iranica*, vol. 3, fasc. 4(December 1988), pp. 489-490.

被认为就是凯扬王朝的阿达希尔(Ardashir Kayanian),这也是《列王纪》中帕佩克将养子取名为阿达希尔的由来。^①Ardashir这一王名,实际上就是阿契美尼德王名阿塔薛西斯(古希腊语 Artaxerxes,古波斯语 Artakhshatra)的新波斯语形式。^②既然帕提亚帝国已经确立了对阿塔薛西斯的官方崇拜,在萨珊帝国这一叙事中,我们自然可以发现帕提亚—萨珊时期伊朗王朝观念的高度一致性和延续性。在凯扬王朝历史叙事中,锡斯坦的鲁斯塔姆家族(House of Rostam)占据了核心位置,并且长期享有王冠赐予者(Tajbakhsh)称号,这与帕提亚帝国前期苏林(Suren)家族的事迹高度吻合。^③不仅如此,作为伊朗史诗中民族英雄的鲁斯塔姆,兼具“帕提亚人(Pahlav)”和“塞种人(Sagzi)”血统^④,可以说充分反映了公元1世纪印度—斯基泰人和印度—帕提亚人在帕提亚帝国东部边疆的融合历程。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萨珊帝国和伊斯兰时期“帕提亚(中古波斯语 Pahlav)”内涵的变迁来管窥帕提亚帝国对中古波斯文化的塑造作用。帕提亚帝国建立后,通过长期的扩张,占有了伊朗高原北部和西部的大片土地,这些地区在萨珊帝国时期又继续作为帕提亚贵族世家的封地。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作为地理概念的“帕提亚”,开始离开其原来所在的伊朗高原东北部,而迁移至原来属于米底人核心区的阿特罗佩特尼(Media Atropetene,又称“小米底”)和大米底(Media Magna),并将这一地区赋予了“帕提亚(Pahla)”的名称。^⑤根据沙普尔一世铭文的记载,萨珊帝国治下的行省排序中,帕提亚(Pahlav)位列第二,仅次于居首位的波斯(Pārs)。^⑥这一时期,阿契美尼德时代指代伊朗高原西北部的“米底(Mada)”已经完全消失。而帕提亚人的原居地 Parthava,已经被萨珊波斯人重新命名为阿巴沙赫尔(Abarsahr,应该源自 Aparni)。^⑦可以看出,萨珊帝国以降,“帕提亚”开始被用来指代伊朗北部原来的米底地区,这也完全符合公元前后斯特拉波关于帕提亚地理范围向西扩张的记载。

根据伊朗语言学家的研究,帕提亚人的语言是一种有少量东伊朗语成分、但其核心词汇为西伊朗语的中古伊朗语。作为中古伊朗语西北方言的帕提亚语(Pahlavanig),与西南方言中古波斯语(Parsig)其实非常相近,两种语言享有共同的名称即巴列维语(Pahlavi)。19世纪的德国东方学家奥尔斯豪森(J. Olshausen)早已指出,Pahla/Pahlav及其各种衍生形式作为族称、地名与历史上帕提亚人曾经活跃过的地区有着十分吻合的对应关系。^⑧Pahlav(复数 Pahlawān)一词也是帕提亚—萨珊时期贵族世家领袖的称号,这一称号逐渐衍生出了“英雄、勇士、骑士、战士、冠军”等含义,被作为中古时代伊朗贵族社会精英集体认同的象征,反复出现在波斯文学作品中。^⑨20世纪初,波斯恺加王朝末代首相礼萨汗(Reza Shah, 1925—1941年在位)在建立新朝的准备阶段,决定使用 Pahlavi 作为自己的新姓氏和王朝的名称。^⑩这一做法固

①《列王纪》在记述帕佩克发现萨珊身世的时候,交代了萨珊与凯扬王朝后期诸王之间的渊源关系:“陛下啊我本是萨珊之后,我是世界之主阿尔达希尔的后裔,巴赫曼是他的另一个名字。他乃是光荣的勇士,埃斯芬迪亚尔之子,他们又都是古什塔斯帕的子孙。”在这里凯扬王朝君主 Kay Bahman 的本名是阿达希尔,萨珊娶帕佩克之女所生之子、后来的萨珊帝国开国君主阿达希尔一世也得名于这一先王。参见[波斯]菲尔多西:《列王纪全集(六)》,宋丕方译,第173页。

②See A. V. Gutschmid, *Geschichte Irans und seiner Nachbarländer*, Tübingen: H. Laupp, 1888, p. 30; A. Sachs, “Achaemenid Royal Names in Babylonian Astronomical Texts,” *American Journal of Ancient History*, vol. 4(1979), p. 131.

③See Ernst Emil Herzfeld, ed., “Das Haus Sūrēn von Sakastan,” *Archäologische Mitteilungen aus Iran*, vol. 1, Berlin: Dietrich Reimer, 1929, pp. 70-80.

④See Saghi Gazerani, *The Sistani Cycle of Epics and Iran's National History: On the Margins of Historiography*. Leiden: Brill, 2015, p. 17.

⑤See Mehrdad Ghodrati-Dizaji, “Remarks on the Location of the Province of Parthia in the Sasanian Period,” in V. S. Curtis, Elizabeth J. Pendleton and Michael Alram, eds., *The Parthian and Early Sassanian Empires: Adaptation and Expansion.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Held in Vienna, 14-16 June, 2012*, Oxford and Philadelphia: Oxbow Books, 2016, pp. 42-46.

⑥See W. B. Henning, “The Great Inscription of Šāpūr I,”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9 (1939), pp. 823-849.

⑦See H. Gaube, “Abarsahr,” *Encyclopædia Iranica*, vol. I, fasc. 1 (December 1982), p. 67.

⑧See Justus Olshausen, *Parthava und Pahlav, Māda und Māh*, Berlin: Ac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876, pp. 13-28.

⑨See Mary Boyce, “GŌSĀN,” in *Encyclopædia Iranica*, vol. 11, fasc. 2 (December 2002), pp. 167-170.

⑩See Donald N. Wilber, *Riza Shah Pahlavi: The Resurr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Iran*, New York: Exposition Press, 1975, p. 229.

然与20世纪伊朗民族主义思潮对伊朗古史的重构密不可分,但Pahlav一词在波斯传统中沉淀千年的、源自帕提亚帝国遗产的丰厚文化意蕴,无疑是巴列维王朝得名的重要原因。

三、古代中国对帕提亚帝国的认知传统及其文明互鉴意义

众所周知,汉文史籍将帕提亚帝国称作安息,安息即开国君主Arsaces的帕提亚语形式Arshak的对译。对于安息国的情况,以《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最有代表性: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①

《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表明,汉朝知识精英所认识的安息是西域大国,务农耕,识文字,城市发达,人口众多,“文明”程度高,而安息人对汉朝的土地物产也充满兴趣。张骞致力于向汉武帝呈现安息这一西域大国的文明化形象,主要目的是加强武帝开边的动力。由于安息是西域“最大国”,汉代史家也尽可能搜集信息,描述这个大国的势力范围,形成对安息“东界”和“西界”的认知。“临勃水”表明帕提亚帝国东部边界到达阿姆河,而公元前119年汉使进入安息境内,应该也是渡过阿姆河,进入帕提亚治下的马尔吉安纳(Margiana,首府即木鹿)。②《史记》称安息“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这里的王应该都不是尼萨,而是更往西的“番兜城”。在司马迁的时代,泰西封尚未成为帕提亚帝国首都,《史记》提到但却不详其名的安息国都最有可能是伊朗高原上的米底旧都埃克巴坦那(Ecbatana)。对于安息的西界,汉籍则往往将其与安息的属国“条支”联系在一起。《后汉书·西域传》对安息西界的记载最为精确,称“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蛮国。从阿蛮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从斯宾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极矣”。③而通过条支役属安息的叙事,汉代史家也认识到了安息的“帝国”属性。

不仅如此,《汉书》和《后汉书》还记载了帕提亚帝国东面有罽宾、乌弋山离这两个拥有众多户口胜兵的“大国”。④《汉书》称安息国“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与乌弋、罽宾同”,⑤即安息、罽宾、乌弋山离三国风俗相同,这表明汉朝对帕提亚帝国、印度—斯基泰和印度—帕提亚之间的文化亲缘性有清晰的认知。⑥尤其是印度—帕提亚人的汉译名“排特”,与《汉书》记载的安息王都“番兜”,都可视作对Parthia一词的原型Parthau的音译。⑦公元97年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在波斯湾遭到安息船夫劝阻,未能完成联络罗马帝国的任务。帕提亚人阻碍罗马与中国直接贸易,劝阻甘英东返,表明帕提亚帝国的丝路中介地位。这也暗示汉代外交决策层已经知晓帕提亚与罗马之间的地缘竞争关系。

必须指出的是,“前四史”对帕提亚帝国的记载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对西域以西的大国地缘竞争和霸权更替的细节观察力不足,帕提亚取代塞琉古成为西亚霸主的复杂过程,以及罗马与帕提亚之间的斗争,在汉文史籍中都未得到充分反映。但我们可以根据汉文史料的“蛛丝马迹”,结合西方文献记载完善对这一时期政治史变迁的认识。汉文史籍记载的安息西界“于罗国”,其实包含了丰富的罗马—帕提亚时代西亚地缘政治变迁信息。“于罗”从读音上看,与幼发拉底河中游西南岸的塞琉古城市杜拉—幼罗波斯(Dura Europos)发音最为接近。杜拉—幼罗波斯始建于塞琉古一世时期,“Dura Europos”意为“欧罗巴人的要塞”。公元前113年,杜拉—幼罗波斯归附帕提亚。帕提亚帝国势力范围遂扩张到幼发拉底河沿岸,杜拉—幼罗波斯进入帕提亚统治时期。公元前113年至公元165年间,杜拉—幼罗波斯处于帕提亚帝国

①《史记·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162页。

②参见王三三:《帕提亚东征与丝路中段的曲折拓展》,《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第11—26页。

③《后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18页。

④现在学界对于汉代罽宾和乌弋山离所指基本达成共识,罽宾相当于印度—斯基泰王国(Indo-Scythians),乌弋山离则相当于印度—帕提亚王国(Indo-Parthians)。参见罗帅:《悬泉汉简所见折垣与祭越二国考》,《西域研究》2012年第2期,第38—45页。

⑤《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89页。

⑥帕提亚帝国与罽宾、乌弋山离三国的文化亲缘性,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三国均为伊朗语人群所建立,帕提亚人与斯基泰—塞种人在东伊朗和西北印度地区接触融合,享有共同的伊朗世界文化;二是三国都受到希腊化文化的影响,同属于东方希腊化世界的伊朗系继承国家。

⑦参见余太山:《安息与乌弋山离考》,《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2期,第82页。

治下,构成帕提亚帝国在美索不达米亚西部的前哨。^①公元165年,罗马军队从帕提亚人手中夺取杜拉—幼罗波斯,至公元256年该城为萨珊波斯军队攻克并毁灭。^②实际上,杜拉—幼罗波斯的历史,恰恰能够与汉文史料对于安息、条支、大秦三者之间关系的记载形成互补。

《史记》记载条支国“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且条支国“临西海”,这一记载使许多学者认为,条支是帕提亚帝国在波斯湾头的属国卡拉克尼(Characene)的首府卡拉克斯·斯帕西努(Charax Spasinou)。在西亚地区名为安条克的希腊化城市中,最为重要的是叙利亚的塞琉古王都安条克。而帕提亚帝国征服两河流域之后,并无任何证据表明卡拉克斯城使用过并仍在安条克(Antiochaea)之名。如果条支为叙利亚的安条克,则帕提亚帝国必然曾经对叙利亚行使过宗主权。最新的研究已经充分表明,米特里达梯二世执政后期及其继承者在位初期,帕提亚帝国通过扶植塞琉古王朝的君主菲利普(Philip),已经将势力范围渗透至东地中海。^③即使后来罗马人摘取了征服塞琉古王国的果实,杜拉—幼罗波斯仍然被帕提亚统治了200余年,这同样可以视作安息对“条支故地”的统治。公元120/121年后,为了加强对杜拉—幼罗波斯及其周边地区的统治和管理,帕提亚帝国在该城设置 στρατηγὸς Μεσοποταμίας καὶ Παραποταμίας καὶ Ἀραβάρχης 一职^④,意为“统管河间及河外地区的将军和阿拉伯酋长”,这与《后汉书》记载的安息国“后役属条支,为置大将,监领诸小城焉”^⑤不谋而合。

由于汉代史家获得关于安息国的信息早于大秦,因此对安息西界的叙述直到《魏略·西戎传》和《后汉书》获得对“大秦”的具体认知后,才逐渐清晰化。^⑥此时,叙利亚的安条克已是罗马帝国东方都会。至甘英西行的时代,“条支”的本土塞琉古王国早已不存。为了阻碍大秦与中国建立官方联系,安息向导只能把甘英带到波斯湾,而不可能让后者走陆路西行至罗马叙利亚。因此,安息西界的“条支”,的确从一开始指代从属于帕提亚帝国的末期塞琉古王国,后来汉代史家则可能将“于罗国”视作安息治下的条支故地。虽然帕提亚的波斯湾属国 Characene,也可以视作“安息西界”。但这一“条支”无论如何都很难对应历史上的塞琉古王国及其遗产。^⑦因此,汉文史籍对于条支役属安息的记载,很可能准确反映了公元前1世纪初帕提亚极盛时期,“安息”在东地中海这一“西海”区域的强大政治影响力。^⑧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史料中的西域信息,相比于西方古典史料而言,虽然极为精简并存在模糊化、理想化倾向。但在公元前1世纪西亚地缘政治变动的历史细节方面,以《后汉书》为代表的汉代官方史书,仍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撑性论述。

四、结 语

在西方古典—基督教史学传统中,罗马帝国被认为是尘世间最后的帝国。而与这一地中海中心偏见相对,罗马帝国以东地区是帕提亚人治下的蛮族世界(Terrae Barbarorum)。罗马人当然知道帕提亚人的存在,甚至承认帕提亚是与罗马对等的东方帝国。但帕提亚自身的历史,与西方普遍史所关心的世界(Oecumene)之帝权转移与人类救赎无关。^⑨可以说,在西方历史观念中,自从经历亚述—波斯—马其

^① See J. A. Baird, *The Inner Lives of Ancient Houses: An Archaeology of Dura-Europo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21-23.

^② See Simon James, “Stratagems, Combat and ‘Chemical Warfare’ in the Siege Mines of Dura-Europos,”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 115, no. 1 (Jan. 2011), pp. 69-101.

^③ See Nicolaus Leo Overtoom, *Reign of Arrows: The Rise of the Parthian Empire in the Hellenistic Middle Ea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268.

^④ See M. I. Rostovtzeff and C. Bradford Welles, “A Parchment Contract of Loan from Dura-Europos on the Euphrates,” *Yale Classic Studies*, vol. 2(1931), pp. 1-78.

^⑤ 《后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18页。

^⑥ 参见余太山:《〈魏略·西戎传〉要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2期,第127—145页。

^⑦ 参见杨巨平:《传闻还是史实——汉史记载中有关西域希腊化国家与城市的信息》,《西域研究》2019年第3期,第32—35页。

^⑧ 参见龙沛:《米特里达梯二世时代帕提亚帝国西向经略与本都王国的崛起——对米特里达梯战争背景的深层考察》,《外国问题研究》2024年第1期,第127—145页。

^⑨ 参见朱君牮、王晋新:《长存多变的“巨兽”——论中古西欧史家“四大帝国”结构原则的运用》,《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6年第2期,第35—42页。

顿—罗马这一普遍帝国更替之后,幼发拉底河以东的世界不再是“文明世界”的中心。^①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希腊罗马史家描述帕提亚人的方式,也决定了现代西方学术界对于帕提亚帝国历史地位的评价。

在古代中国,通过《史记》《汉书》《后汉书》对西域诸国的记载,帕提亚以西域大国“安息”的形象呈现在汉代中国知识精英面前。安息人“田稻麦,蒲陶酒”“画革旁行以为书记”等与“野蛮人”难以对等的“文明化”信息,呈现出致力于建设汉朝西方之异域文明的安息帝国形象。这与地中海世界所观察到的、长期威胁罗马文明世界的帕提亚帝国形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在伊朗—波斯历史传统中,“帕提亚(Pahlav)”和“安息(Arshak)”则承载着独特的伊朗民族史意义,并以“阿什康尼人(Ashkāni)”“阿什康尼王朝(Ashkāniyān)”“裂土藩王(Muluk al-Tawa'if)”等形式为伊朗人所记忆,体现出伊朗史学传统对这一王朝及其遗产正反两面且复杂多变的价值评判。

公元5世纪,拜占庭史家普里斯库斯(Priscus)仍然以“帕提亚人”这一古风化(archizing)的族称指代萨珊波斯人^②,可见古典史学传统中“帕提亚”这一“东方他者”形象的根深蒂固。但同样不应忽视的是,“帕提亚人”作为伊朗贵族社会的支柱,的确延续到了萨珊帝国时期,并且为中古伊朗民族文化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养分。而古代中国对帕提亚帝国的认知传统,在体现出“美美与共”的平等文明观的同时,提供了帕提亚极盛时期经略东地中海的关键信息,中国史学传统对于世界史研究的价值由此彰显。

本文的研究表明,如果想要全面认识帕提亚帝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我们不仅需要将古典史料的时间范围向下延展,同时考察萨珊帝国以降的阿拉伯—波斯史料,还需要从看似已经难立新论的中国史料中发掘新信息。三种认知传统中的帕提亚帝国,均从不同的视角体现了帕提亚帝国文化记忆的持久性和帕提亚人文化遗产的多样性。而三种史学传统记录的帕提亚人形象和帕提亚历史,在许多方面是可以互为支撑的。从帕提亚这一案例可以充分说明,东西方多元史学传统的交流与互鉴,同样是中外文明互鉴的重要层面。而在更广阔的时空中对安息王朝展开多元史料的考察,必将有力推动对这一古代西亚文明的深入研究。

[责任编辑:雷金凤]

The Evolution of Parthian Cultural Memory in the Ancient Eastern and Western Worl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Cross-Referencing

LONG Pei, GUO Xin-ru

(School of Regional and Country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7)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information and cultural memory of Parthia recorded in Western classical sources, Persian sources and Chinese sources exhibit a closely complementary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The legitimacy of the Arsacid royal lineage and the collective identity of the Parthian nobility represent significant political and cultural legacies left by the Parthian Empire. Chinese historical record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leucid Empire and the Arsacid Dynasty effectively supplement the basic framework of Parthian history constructed by Western classical historians. The Parthian Empire left a distinct cultural memory in the ancient Eastern and Western worlds. The cross-referencing and interaction among these three historiographical traditions powerfully reveal the diversity and enduring nature of the Parthian Empire's civilizational heritage.

Keywords: Parthian Empire, Arsacid Dynasty, Cultural Memory, Historical Cross-Referencing

①参见汪丽红:《西欧“普世史”历史空间的形成》,《江海学刊》2023年第4期,第219—227页。

②See Priscus, *The Fragmentary History of Priscus: Attila, the Huns and the Roman Empire, AD 430—476*, trans. John Given, New Jersey: Evolution Publishing, 2014, XXXIII. 1, p. 117.